

## 蔡旭教授与我的一段难忘交往

杜鸣銮\*

1952年8月我从母校的农艺学系毕业,分配到沈阳农学院(1985年10月5日更名为沈阳农业大学)任教。后因参加中央农业部在北京举办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而晚去报到。由于是全国性的讲习班,母校只分配到4个教师名额(蔡旭、李竞雄、姜秉权和刘及时)。讲习班地点设在原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今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了使母校广大师生听到讲习班的课程,母校派人录音、记录并负责整理印刷讲义供全国班及母校分班使用。我和同班的张德颐同学派往华北所做记录并在那里食宿,有幸和蔡、李等教授同吃、同住、同学习米丘林遗传学,并结识了国内农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丁颖、杨显东、肖辅、奚元龄等。

当时食宿条件很差,我保留的两张讲习班伙食费收据证明每日伙食费相当于1955年初币制改革后的0.4元。讲习班学员前期(1953年元旦之前)住在华北所畜牧系的大实验室或大作业室,睡的是双层铺,年纪大的睡下铺,年轻的睡上铺。1953年元旦以后,华北所西正门南侧新落成一批家属宿舍,每套可住三四人,于是蔡老师、张德颐和我共3人要了一套,从讲习班的大宿舍搬入。当时该家属宿舍通电而未通水,要从附近的单身宿舍取水洗漱,这个任务当然落在我们两个学生身上。这次与蔡旭教授同住一起,从1953年1月初到2月底正好两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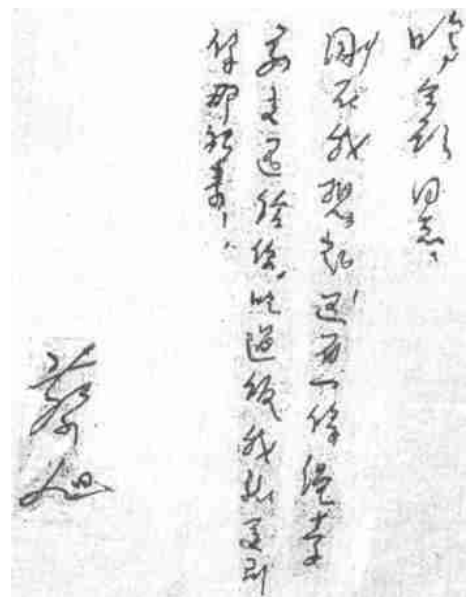
蔡老师平易近人、和善相处,关心我们两个年轻人。而且工作非常刻苦。这一段因讲习班临近结束,要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一批作物育种各论教材,蔡老师是《小麦育种》的主编,晚间回来很晚,经常到午夜之后,第二天早晨起得晚一些,往往来不及洗脸,用干毛巾擦擦脸,并戏称“干洗一下”。这美好的记忆距今已有52年之久。

讲习班于2月28日结束,3月1日早饭后我收拾好蔡老师、张德颐和我3人的行李,雇了一辆三轮车返回当时母校在复兴门外罗道庄地址,将蔡老师行李送至他家中。蔡老师的行李是用我的一条绳子捆的,这条绳子我没有多大用处了,而且也忘记了这

档子事。不料回到学生宿舍后蔡老师让他的孩子送来一张条子,上写“鸣銮同志:刚在(才)我想起,还有一条绳索要交还给你,吃过饭我就要到你那里来!蔡旭”(附件)。这张条子距今已52年了,“文革”期间沈阳农学院下乡三次搬迁,1975年在乡下还遭遇一场大水灾,这件“文物”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一直保存至今。几年后我想起此事,蔡老师为什么不直接让他的孩子将绳索还我,而先送来条子,晚饭后又亲自来我处看望我们晚辈,答案只有“师生情深,为我们送别”。几天以后我离开母校赴沈报到。

30年后的1983年,4月初,我要赴美作访问学者,在北京西郊万寿路原农牧渔业部招待所等待航班。一天中午我赶到马连洼看望几位恩师。那时蔡老师已担任副校长主管研究生工作,住房条件比我1976年夏天从大寨返沈路过北京看望他住在农大供销社附近的农场工人宿舍时大为改善。4月初的北京已春暖花开,我从蔡老师家走出来要去姜秉权老师家,蔡老师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口罩,坚持要把我送到姜家。看来蔡老师的身体条件并不理想,但我决没有想到这是我与恩师蔡旭教授最后的一次会面!

附件 蔡旭老师送的便条的原件



收稿日期:2005-03-18

\* 杜鸣銮,原北京农业大学农艺学系1952届毕业生。